

## 第二章 中日對於九一八事變的反應

###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之爆發

1931年9月18日晚間10點20分，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川島中隊以巡察南滿鐵路為名進入了瀋陽東北邊一個名為柳條湖的地方。一行人抵達後，在河本末守中尉率領下按既定計畫爆破南滿鐵路一段，緊接著又傳來廿四釐重炮之爆炸聲響，戰事隨即開展，此即史上著名之九一八事變。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以中國士兵炸毀南滿鐵路為由向北大營發動猛攻，當時駐守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為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另一方面，關東軍步兵第二十九聯隊也往瀋陽進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感到事態嚴重，馬上撥電話請示此刻遠在北平的張學良副總司令，結果獲得避免衝突、不以武力報復的訓令，以免變成積極之敵對行為。在此命令下，王以哲只好採取不抵抗的姿態，令官兵逐一退出營房，過程中除第六二〇團因奪路出避而與日軍爆發小規模衝突外，其餘多撤至二台子。<sup>1</sup>

未幾，日軍以野戰炮向北大營迫擊炮廠、兵工廠展開射擊，由於廠房內藏有大量火藥，一旦命中則瀋陽將陷入一片火海，故中國交涉員主動向日本領事要求說明炮擊動機同時立請制止，明治大學出身、東三省最高顧問趙欣伯甚至直接向奉天的森島領事表明中國將採不抵抗主義，<sup>2</sup>仍以失敗告終，理由是：「軍隊行動，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隔天凌晨兩點，又有重炮自西關高台廟南滿鐵道倉庫發射，大小西關各處亦槍聲四起，日軍進佔市內之迫擊炮廠，殺害工人四十餘名，職員一人。19日清晨6點，瀋垣內外貼出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之安民布告，內稱「昭和6年9月18日午後10點30分，東北軍之一隊在奉天西北側北大營附近爆破我南滿鐵路，並驅其餘威襲擊日本軍守備隊，對我展開對敵行動」，把開第一槍的責任推給中國，稱中國不僅侵犯了日本依據條約正當獲得的南滿鐵路利權，更進一步對日本軍隊發槍開炮，「很明顯是東北軍在對我挑釁」。本庄觀察近來東北局勢，認為四處充斥侵犯日本權益與侮日之場景，此絕非一時的感情之誘因，若放任不顧，「則我國在滿蒙利權之覆滅已是十分明顯的了」。對此，本庄繁稱關東軍乃「夙負保護鐵路之重責者，並為擁護其既得之利權、確保帝國軍之威信」，面對東北軍的挑釁，唯有「斷然處置、無所猶豫」。文末，尚挑明「我軍欲厲懲者，彼東北軍權而已...至於一般東北民眾的生計則一直都為本職所關切」，對東北軍民施以分離待遇，顯見其欲挑撥、分化東北民心之意圖。<sup>3</sup>

<sup>1</sup> 梁敬錚，前引書，頁27。

<sup>2</sup> 森島守人著，趙連泰譯，《陰謀、暗殺、軍刀：一個外交官的回憶》，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3。

<sup>3</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一卷第一冊》，頁27。

上午 8 點，日軍攻入瀋陽城內，解除一切軍警武裝，佔據官署，搜查文卷，捉捕軍官。午時左右日軍已完全佔領瀋陽，所有軍、政、民、文化、財政等機構和全國最大的瀋陽兵工廠、製炮廠及兩百架飛機盡落其手，統計一夜之間，損失達十八億元以上。<sup>4</sup>東三省官銀號中國、交通、邊業各銀行均經侵入，行人遭槍殺，文官未逃走者多被監視，被捕軍官則被迫簽字承認華軍先行攻擊、破壞鐵路。嗣中方委託各國領事代詢暴行原因，日軍反將責任推至中國方面，稱中國破壞鐵路才是事變起因，拒絕停火。<sup>5</sup>至午後 3 點本庄繁到瀋，槍聲始息，惟拒絕與在瀋中國當局進行談判。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首先是想佔領以瀋陽為中心的南滿路與南滿、安奉沿線重要據點，藉此牢固對南滿的控制。故在柳條湖事變爆發後本庄繁司令官立即做出「關東軍全線出動，對中國軍隊發起攻擊」之決定，命令各部隊迅速佔領南滿鐵路沿線重要城市，消滅中國軍隊。在佔領瀋陽的同時，日軍分向安東、鳳凰城、營口發動攻勢，拿營口是為防堵錦州方面東北援軍的反擊，至於鳳凰城及安東是為確保安奉線的運輸順暢，以便朝鮮軍能利用安奉線適時支援關東軍。<sup>6</sup>19 日清晨 5 點半，身兼中朝邊境重鎮和遼東重要交通樞紐的安東首先陷落；同一時間駐大石橋的獨立守備隊第三大隊隊長岩田中佐亦率部進犯營口，並於 8 點半佔領海防練軍營、縣政府等軍政機關和車站、碼頭等交通樞紐，對營口實行了軍管；作為安奉路上軍事重鎮的鳳凰城當時雖駐有省防軍姜全我部一個團，但在面對板津中佐率領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三大隊的攻勢下，也因遵循不抵抗命令而被解除武裝，上午 10 點鳳凰城為日軍所佔。<sup>7</sup>由於事前已作過周密的計畫與演習，日軍攻佔安東、鳳凰城、營口三處的過程十分順遂。

受到瀋陽攻城戰異常順利的鼓舞，原本不是關東軍首戰目標的長春也被排進了軍事行動時程。<sup>8</sup>長春乃南滿鐵路的終點，同時為南滿路與中東路的交接點，吉林、安東省特別區的交界，以及吉林市門戶和吉北、吉東的咽喉，交通地位重要。佔領了長春，即可東取吉林、北取哈爾濱、西圖洮南，進攻齊齊哈爾。<sup>9</sup>19 日清晨 3 點多，日軍步兵第四聯隊向長春發動攻擊。四點開始炮擊，隨即襲擊了東省特別區管轄的寬城子區，並將特區第二區警察署包圍繳械。4 點 30 分進攻中國軍隊駐二道溝的東北獨立步兵二十三旅，上午 11 點佔領二道溝寬城子車站。南嶺方面，因中國駐有獨立步兵二十五旅和炮兵十九團，另有輜重兵一個營和彈藥庫，日軍擔心自身兵力不足，於是又緊急從瀋陽調派援軍。下午 5 點 30

<sup>4</sup> 姜念東主編，《歷史教訓：九一八紀實》，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 月初版，頁 196。

<sup>5</sup> 李雲漢編《九一八事變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82 年 11 月二版，頁 263。

<sup>6</sup> 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政治大學歷史學報》，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 年 11 月，頁 186。

<sup>7</sup> 關捷主編，《日本侵華政策與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初版，頁 140。

<sup>8</sup> 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政治大學歷史學報》，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 年 11 月，頁 189。

<sup>9</sup> 易顯石等著，《九一八事變史》，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 年 2 月，頁 167。

分，南嶺為日軍所佔。日軍在向寬城子和南嶺中國軍隊進攻的同時，也向長春市區的警察局、電燈廠、無線電台出動，不到一日，長春盡喪敵手。<sup>10</sup>

攻下長春後，關東軍絲毫沒有鬆手的打算，接下來把目光轉到吉林與哈爾濱。之所以要攻打這兩處，除為鞏固對南滿的佔領外，亦著眼於下一階段的北滿攻略。9月20日，吉林日僑以中國軍隊炸毀其住所為由，連同當地特務機關一同向關東軍要求出兵保護。在建川、板垣與石原的強烈請求下，本庄繁做出了進攻吉林的決定。21日上午日軍第二師團由長春出發進攻吉林市，由於身兼代理省主席、吉林邊防署司令的熙洽早已和日本達成默契，將守城軍隊調離省城，故日軍兵不血刃地進佔了吉林，隨即將財政廳、永衡官銀號、金庫全給封鎖，其他軍械廠、印花稅處、森林局等軍政機關一律接收、監視。由於關東軍政治謀略成功，加上該省原本就不屬張學良的直轄地區，故激烈的武裝抵抗並未出現。23日多聞二郎師團長、大迫通貞顧問、關東軍代表今田新太郎大尉與熙洽共同舉行了關於吉林獨立的秘密會談，隨後敲定省府人事與軍隊整編。<sup>11</sup>9月28日，吉林省宣佈由國民政府獨立，也是東三省第一個獨立者。

至於哈爾濱方面，日軍同樣依循瀋陽、吉林攻略的老路，先於21日夜間自行在朝鮮銀行、哈爾濱日日新聞社、哈爾濱日本總領事館等地製造爆破事件，再歸咎到中國民眾的排日行動，為此哈爾濱總領事大橋忠一多次向關東軍請援。就在本庄繁即將答應所請向哈派兵時卻突然被來自東京陸軍省的安藤利吉兵務課長阻止，安藤帶來了南次郎陸軍大臣的「三勿命令」，大意是在中國已將瀋案提請國聯以及美蘇等國關切等國際形勢考量下，禁止關東軍向哈爾濱攻擊，同時明令其不得以保護僑民為由出兵延邊。受此限制，關東軍悻悻然取消了北上的計畫。儘管如此，關東軍還是與哈爾濱的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建立起默契，令張暫時按兵不動、維持現狀，待局勢益發明朗，特別是確認蘇聯意向後再行起事。在9月22日關東軍諸參謀假瀋陽東拓總部擬出的「利用五鎮守使傀儡溥儀，策立滿蒙共和國」政略中，決定建立一個以溥儀為首，含跨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的獨立政權，由下列五人分疆為治：熙洽守吉林、張海鵬守洮寧、湯玉麟守熱河、于芷山守東邊道、張景惠守哈爾濱。由該決議可看出關東軍在起事前早有部署，舉凡人事安排、統治區之劃分與相關行政事宜等均在其掌握之中，因此也才有熙洽開門迎敵與張景惠的陣前通敵。雖說受限於國際局勢張並未於第一時間宣佈脫離中國，但其組織治安維持會之舉無疑就是在為即將到來的獨立作事前準備。

日軍攻勢宛如水銀瀉地般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到9月19日止除前述的瀋陽、北大營、安東、鳳凰城、營口、長春外，南滿路沿線重要城市包括鞍山、海

---

<sup>10</sup> 同前註。

<sup>11</sup> 山口重次，《滿州建国》，東京：行政通信社，1975年初版，頁106。

城、開原、鐵嶺、撫順、四平街、本溪湖等也為關東軍所控制，吉林亦於 21 日陷落，過程之順利就跟顏惠慶（時任國民政府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所言如出一轍：「我軍按站撤退，日軍按站佔領，無殊彼此換防」。<sup>12</sup>

日軍攻下吉林後，暫且繞過哈爾濱，繼續沿洮昂路北進，目標瞄準黑龍江。因受到中央「不擴大」方針之限制與先前成功策反熙洽的經驗，關東軍覺得依循熙洽老路是較為可行、省力的作法，故在其「關於征服北滿之方略」中，特別強調了和平處理的重要。此時，關東軍挑中的人選是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日方對張海鵬未能被張作霖父子提拔擔任黑龍江省主席、督軍始終耿耿於懷一事知之甚詳，遂派遣滿鐵洮南公所的河野正直、關東軍司令部的今田新太郎等，以提供軍火、軍費及封官等事予以拉攏。張學良知道後先是勸其「坐鎮洮南，防敵北犯，勿為日人利用，致貽後世之譏」，<sup>13</sup>稍後又成立蒙邊督辦公署，以張海鵬為督辦，總理蒙邊事務。但這一切努力都比不上日軍提供的三千支槍、二十萬發子彈和二十萬元現金，張海鵬終究選擇倒戈。10 月 4 日關東軍首次命張部向黑龍江省進攻，並密派第二師團獨立飛行隊第八中隊助戰，惟因張猶豫不決且當日強風使日軍航空中隊無法起飛，行動宣告流產。<sup>14</sup>10 月 15 日，張海鵬正式向嫩江橋進攻。

為應付即將到來的戰事，張學良緊急命令黑龍江省軍步兵第三旅旅長兼黑河警備司令馬占山代理黑龍江省府主席兼軍事總指揮，並命哈爾濱中國銀行撥款五十萬資助馬部，決意擊退進犯敵軍。馬占山接受任命後，隨即炸毀嫩江鐵橋，阻止張海鵬部前進。張部於 15 日欲強行渡河，卻反遭中國守軍迎面痛擊，而這也是事變以來東北軍首次告捷。

眼見張海鵬已不可恃，關東軍只好直接投入戰事。日軍藉口中國炸毀嫩江鐵橋致使洮昂鐵路運行完全中斷，「而該鐵路不僅是國際交通之幹線，亦為向日本借款作擔保所修建，且正值二百五十萬噸北滿特產的上市季節，該橋樑之破壞不僅滿鐵將遭受巨大損失，亦大大影響中國民眾經濟生活」，<sup>15</sup>遂提出交由滿鐵修理的請求，遭馬占山以黑省自行修復拒絕。10 月 27 日齊齊哈爾特務機關長林義秀向馬占山提出一週內修復鐵橋之請求，當然他很清楚不可能實現，但卻是一個藉機發兵的好理由。兩天後滿鐵透過齊齊哈爾領事清水對馬占山提出更強硬的通牒，除限定於一週內（即 11 月 3 日前）修復，更帶有「如不應允，帝國將以實力進行修理」字眼，<sup>16</sup>暗示動武之可能。

11 月 4 日，日軍以步兵十六聯隊搭配一個大隊野戰兵、兩中隊工兵共一千

<sup>12</sup> 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1973 年，頁 165。

<sup>13</sup> 馬越山，《九一八事變實錄》，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 8 月，頁 215。

<sup>14</sup> 易顯石等著，前引書，頁 173。

<sup>15</sup> 姜念東主編，《歷史教訓：九一八紀實》，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 月，頁 134。

<sup>16</sup> 同前註。

五百四十四人，加上張海鵬部七千人向嫩江展開攻勢。<sup>17</sup>在三日激戰過程中，馬占山部多次擊退敵軍，惟在日軍掌握空優與重裝備武器下本身亦損失慘重，六日不得不撤退至大興以北三間房一帶防線。之後幾天關東軍多次向馬占山提出下野、撤兵之要求，呼籲馬與張海鵬達成和平的政權授受。11月12日，關東軍司令本庄繁致馬占山通牒，要其答應（一）下野（二）自齊齊哈爾撤軍（三）日本軍之一部為保證洮昂線安全起見，應向該線昂昂溪車站出進，<sup>18</sup>並限於當天午夜前回答。馬占山再次回絕，於是日軍於14日重啟攻勢。在此次戰事中，日軍投入事變以來最大的兵力，計達五千九百人之譜，<sup>19</sup>外加張海鵬偽軍七千人，可見馬占山這一階段帶給他們多大的威脅。經過一番激戰，不論在人數、武器性能皆處劣勢的馬占山部終究選擇於19日退出齊齊哈爾，轉進克山、海倫，結束了這一階段的黑龍江保衛戰。雖然馬占山未能守住齊齊哈爾，但幾場硬仗打下來已讓關東軍見識到中國軍隊不可小覷，也大大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操，之後東北愛國義勇軍及各游擊隊之組成都給日軍帶來很大困擾。

拿下黑龍江後，關東軍下一個目標是錦州。錦州乃遼西重鎮，位處北寧、錦朝兩路交點，為連接東北與關內之咽喉。奪下錦州象徵遼寧全境平定，也是關東軍軍事進展的一個里程碑，同時更可作為下階段熱河、平津攻略之灘頭堡，凡此皆其勢在必得的原因。另一方面，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張學良在錦州設立了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與遼寧省政府行署，分交張作相、米春霖負責，與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一同肩負起軍政大任，欲藉此展現堅守遼西的決心，並伺機接應東北抗日義勇軍。

張學良在東北的勢力一天未除，關東軍就一天無法安心，故於10月8日對錦州展開了轟炸。由於幣原外相在7日才剛向美國駐日代辦做出決不擴大事變聲明，關東軍此舉遂招來國際社會一片嘩然，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更怒召出淵大使，當面向他指責幣原的失信。由於關東軍攻擊錦州既非出於護僑、更無涉於鐵路利權之交涉，所以在很多國家看法裡都認為這是一次全然的侵略行動，目的只在於剷除張學良勢力，故包括英、美、法、義、西等國駐日大使都提出了抗議，國聯行政院亦於10月24日通過了限期撤兵之決議。雖說該決議因日本投下反對票導致未能成立，但已對其形成了很大的國際輿論壓力。為此關東軍改採利用中國盜匪、擴大遼西親日勢力的手法，企圖顛覆遼西的中國政權，過程中包括凌印清、張學成等皆為所用。關東軍收買中國盜匪用意有二：（一）製造出兵藉口。先令盜匪於各地生事，再藉維護地方秩序名義出兵（二）實行「以華治華」策略，利用盜匪與其他親日勢力直接挑戰錦州政權。<sup>20</sup>但因遼西政府處理得當，關東軍的策略遂一再失敗，迫使其走上跟黑龍江攻略同樣的道路，就是得自己下場扮演主

<sup>17</sup>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96~97。

<sup>18</sup> 李雲漢編，前引書，頁307。

<sup>19</sup> 陸軍、杜連慶，前引書，頁98。

<sup>20</sup> 易顯石等著，前引書，頁180。

攻了。

早在關東軍計畫進攻北滿時，便曾與華北天津駐屯軍達成默契，令天津軍製造事端，以替關東軍西下錦榆編織藉口。11月，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奉關東軍命令到天津來製造了兩次事端，第一次預定在11月8日晚起事，然以失敗告終。第二次則於11月26日爆發，雖仍不成功，但關東軍旋以天津軍被中國軍隊包圍、需即刻前往馳援為由沿北寧路西進，欲藉援津之名，行攻錦之實。<sup>21</sup>在27日參謀本部作戰課幕僚會議上，因天津暴動的真相為建川所揭發，加上政府擔心遭致國際反彈，遂由參謀總長金谷向關東軍發出「臨參委令」，迫使其停止前進，將先頭部隊調回遼河以東，停止進攻錦州。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態度在11月中旬後漸趨積極。11月19日，蔣中正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代表主席團向大會提議〈團結禦侮辦法案〉，表達願親自北上共赴國難之決心，隨即以緊急動議方式通過。然而，顧維鈞和張學良對此不表贊同，顧稱蔣北上雖可使世界視聽為之一震，「然日方正在肆意侵略，借題發揮，無微不至，若我方有類似軍事關係之行動，則彼藉口自衛，益必振振有詞，在外交上或須更費唇舌」，<sup>22</sup>由此加以勸阻；張學良亦不願蔣北上，而傾向採「和平方法」解決。在聽取顧張兩人意見後，蔣中正打消了親赴前線的念頭，國府改採張學良口中的「和平方法」來對付進窺錦州的日軍。所謂「和平方法」，即顧維鈞所提「錦州中立區」的概念。顧氏曾代表中國向英、美、法三國駐華公使建議，倘日方堅持中國軍隊需撤退，則中國可自錦州退到山海關，惟前提是日方需向上述三國擔保，絕不向錦州至山海關間區域發兵，且干涉該區域內中國之行政機關與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國認為滿意。<sup>23</sup>「錦州中立區」之倡議確曾給中日和平帶來一線曙光，惟在英、美、法三國政府對擔保一事不願承諾，而日本對26日國聯行政院主席白里安提議「派遣觀察員考察錦州劃設中立區可行性」又持反對意見，該倡議終告破局。既然中立區不可行，國府又不願直接對日談判，錦州戰事一觸即發。

當時在錦州的東北軍計有步兵四旅、騎兵兩旅及砲兵一旅，總數約六萬人，外加中原大戰時入關的兩個軍、宋子文應允的財政部稅警團三個團，總兵力可達八、九萬人之譜，<sup>24</sup>應有對日一戰能力。然而，此時日本政局也產生了極大變化。1931年12月11日，民政黨的若槻內閣總辭，接任者為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政友會組閣象徵遵循國際協調路線的幣原外交行將破滅，取而代之者將是政友會一貫

<sup>21</sup> 梁敬鎔，前引書，頁109。

<sup>22</sup> 〈顧維鈞、劉哲致張學良電稿〉，1931年11月23日，電稿選輯，轉引自劉維開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2年6月，頁293~294。

<sup>23</sup> 〈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稿〉，1931年11月24日，電稿選輯，轉引自劉維開編，前引書，頁295~296。

<sup>24</sup>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國史館印行，1995年6月，頁29。

強硬、進取的對華路線。此刻，政府與關東軍在侵華一事達成高度共識。新任陸相荒木貞夫於 12 月 16 日閣議上大力倡導增兵、進攻錦州，絕不允許當地中國政權之存在。新內閣確實聽見了荒木的呼籲，隔日便決定增派一個混成旅團、一個戰車隊到東北，兩個步兵大隊到天津，十天後又自朝鮮軍抽調一個混成旅團及一個轟炸機中隊到東北。在這兩波的增兵行動裡，東北日軍總數擴增至兩萬三千多人，<sup>25</sup>對進攻錦州發揮了絕大助益。由於新內閣已不再阻止對錦州出兵，關東軍便於 12 月 17 日自北寧、大通、營溝三線西進，開展了戰事。在其凌厲攻勢下，法庫、彰武、田莊台、盤山盡落其手，31 日佔領營溝全線，錦州已在咫尺。

面對日軍進犯，張學良卻抱怨遲遲無法自中央獲得彈藥接濟，且任由陳友仁在背後勾結日人扯他後腿，故在保存東北軍元氣、也求鞏固華北防務雙重考量下，他無視國民政府於 25 日、30 日兩度要求積極抵抗之命令，選擇自 30 日起開始撤退。到 31 日午間為止，已有一萬多部隊入關。<sup>26</sup>張學良棄城而走讓關東軍兵不血刃地進佔了錦州，時為 1932 年 1 月 3 日。錦州撤退象徵中國政府在東三省原有的行政組織全數瓦解，而關東軍如此輕易地席捲了東北，更大大激發了日本國內的侵華情緒直至沸騰，日軍下一步要瞄準的就是華北了。

---

<sup>25</sup> 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政治大學歷史學報》，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 年 11 月，頁 210。

<sup>26</sup> 劉維開，前引書，頁 30。

## 第二節 日本政府的反應

9月18日深夜至隔天凌晨，關東軍一連向東京軍部發了三封電報，報告瀋陽事變經過：

第一電：奉字二〇五號，九一八夜十一時十八分發（東京九一九午前一時到）  
「夜十時半，奉天北大營西，中國軍隊破壞滿鐵線，襲擊我守備兵，迫我守備隊與生衝突，第二大隊正向現地出動中」。

第二電：奉字二〇八號，九一九午前零時十分發，午前二時到。  
「北大營中國軍隊炸毀滿鐵線，其兵力約有三四中隊，逐次遁入兵營。我虎石中隊，十一時與北大營兵士五六百人交戰中。現已占得北大營一角，敵人機關槍步兵炮正在增加。中隊苦戰，野田中尉受重傷」。

第三電：九一九午前三時到（發電時間不詳）  
「坂原參謀正作如下之處置：1. 守備第二大隊掃蕩北大營 2. 步兵第二十九聯隊攻奉天城 3. 守備第五大隊攻北大營之北，受第二大隊之指揮 4. 要求第二師團以主力增援」。<sup>27</sup>

由這三封電文看來，關東軍完全把肇事責任推給中國方面，意圖製造其作為受害者、迫不得已而行使正當防衛之形象。關東軍此舉無疑是成功的，因為在19日上午7點舉行的軍部會議上，眾人一致認為其處理得當，並在參謀本部二宮治重次長、橋本欣五郎第二部長的提議下，一致通過向內閣提出增兵案，交由第二課負責起草。會上軍務局長小磯國昭指出：「關東軍此次行動，完全是根據本身任務採取的適合時機之措施」，<sup>28</sup>雖說他也擔心會留給外界軍部刻意製造事變之印象，但最終還是順應了眾人的決議，支持增兵。<sup>29</sup>

然而，在10點舉行的內閣會議上，外相幣原喜重郎卻提出了與關東軍所敘述截然不同的一連串情報，包括：中國軍隊並未抵抗、關東軍少佐參謀花谷正持刀恐嚇森島奉天領事，不允停戰、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要求停戰無效等，至此整個局勢急轉直下，逼使原本南次郎陸相要提出的增兵案又給硬生生吞了回去。若槻首相當天亦曾詢問南次郎瀋陽之事是否確因中國士兵破壞鐵路、並攻擊日本守備兵而起？且擔心如果真是關東軍之陰謀，則日本在世界的立場將如何自處？閣議最後達成下列五點決議：

- （一）事變不得擴大。
- （二）禁止拓務省關東廳及滿鐵參與事變。

<sup>27</sup> 梁敬錚，前引書，頁76。

<sup>28</sup> 關捷主編，前引書，頁479。

<sup>29</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卷資料篇》，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頁113。



- (三) 由總領事館就近監報關東軍行動。
- (四) 分飭遼陽多門師團、天野旅團及守備隊森連司令各將所屬隊伍，向瀋陽集中。
- (五) 長春旅團擔任警戒，以自衛為限。<sup>30</sup>

由此看來，事變初期日本政府採取的是一種不擴大事端的態度。陸相南次郎亦致電關東軍，轉告閣議之決定：

**陸第一〇四號電：「關於本次日中衝突事件，起因於中國軍隊破壞滿蒙鐵路，其非雖在彼，惟帝國政府方面決定盡力使事態不擴大，以上即希之照遵行」。**<sup>31</sup>

參謀本部也於當天下午 6 點致電關東軍司令：

**「一、九月十八日夜間以後關東軍司令之決心與處理，尚能適應機宜，時已倍增皇軍之軍威。二、鑑於事件發生後中國方面之態度，有關事件之處理，閣議亦有不超越必要限度之決定，故今後軍隊行動應依此主旨善加處理」。**<sup>32</sup>

雖然暫時遏止住關東軍的冒進，但卻絲毫沒有對其擅啓戰端的行為加以苛責，也可看出軍部高層有刻意護短的嫌疑。另一方面，在關東軍向瀋陽進攻的同時，朝鮮軍也展開了行動。9 月 19 日上午，東京軍部接到朝鮮軍司令林銑十郎拍來的兩封電報：

**「鑑於奉天情況，已派平壤飛行機第六聯隊（戰鬥、偵查各一中隊）於本晨出發，增援關東軍。…龍山第二十師團之混成旅團，已做出動奉天之準備。朝參第一號」。**

**「據報間島、琿春情勢危急，為策應關東軍及將來佔得地步起見，認為有出動混成旅團前往間島、琿春之必要。朝參第二〇號」。**<sup>33</sup>

原來早在石原等人密謀行動時，便已和朝鮮軍方面接觸，並取得其高層、特別是神田正種參謀大力允諾，一旦關東軍起事，朝鮮軍立時響應；另外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在同年 8 月由陸軍省召開的「軍司令官、師團長」聯席會議上，也已跟朝鮮軍司令林銑十郎就援助關東軍起事達成默契。故 19 日朝鮮軍動員了兩個航空中隊、步兵第三十九旅團前往助陣，同時做好發兵間琿準備。朝鮮軍此舉帶有兩層含意，首先根據朝鮮軍司令部條例，軍司令只有調動朝鮮境內行動之權，若要執行境外出擊，則必須握有奉勒命令，<sup>34</sup>故本次出動顯然侵犯到天皇的統帥權。

<sup>30</sup> 梁敬錚，前引書，頁 78。

<sup>31</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二卷滿州事変》，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 年，頁 26。

<sup>32</sup> 同前註。

<sup>33</sup> 同前註，頁 6、35。

<sup>34</sup> 中村菊男，《滿州事変》，東京：日本教文社，1965 年 2 月初版，頁 135。

再則，間島、琿春乃日俄勢力交界，貿然進擊恐將刺激蘇聯，破壞大局。

參謀總長金谷對朝鮮軍的擅自行動十分不滿，故於當日正午 12 點 30 分連發三封電報，對林銑十郎司令、步兵第三十九旅團長嘉村達次郎、新義州守備隊下達了停止前進命令，但是航空隊的一部分已於 19 日下午抵達奉天。至於間琿方面，為防止日蘇開戰局面的出現，若槻首相無視於間琿當地要求出兵護僑之呼聲，寧願徹僑也不願發兵，終於逼使軍部對朝鮮軍施以壓力，中止出兵。

本庄繁在 19 日下午 5 點、7 點曾向軍部致電，大意是要求加派三個師團的援兵，並重申藉此一舉解決滿蒙問題的迫切性。然而他的意見並未獲得軍部的贊同，不但陸軍省覆電「地方行政不該超過維持治安範圍」、參謀本部亦指示「遵守貴軍原本任務，靜觀變化」。<sup>35</sup>對此關東軍感到很沮喪，加上得知朝鮮軍亦被阻絕於邊境，使他們益發焦慮，擔心重演當時炸死張作霖的結局，結果無疾而終。為了研究下一步該怎麼走，建川、板垣、石原、花谷、片倉五人於 19 日深夜至隔天凌晨聚首共商對策。由於建川在軍事行動應發展到何種程度、東北政權性質兩個問題上與石原等人意見相左，所以沒有達成共識。在前一個問題上，建川認為不應北進至越過洮南和洮兒河之線以北，以免刺激蘇聯，對此石原等則斷定俄軍不會出動，且解決滿洲問題的大好良機稍縱即逝，故應乘勝追擊；在第二個問題上建川則主張建立與日本合作之親日政權，石原等則欲將滿洲直接納入日本版圖，受日本統治。建川的想法與關東軍諸參謀之差異在於他考量到較多國際情勢的變化，故採取穩健、徐圖進取之態度，反之石原等人卻基於本身對滿洲事務的熟識而力主一舉成事，雙方缺乏交集，會議就此結束。<sup>36</sup>然而，於下一回合會談中，建川態度有所軟化，贊成對吉林、察哈爾出兵，並同意在東北建立傀儡政權。

徵得建川同意後，關東軍諸參謀一致向本庄繁司令建議進攻吉林。先由新井參謀對當地狀況進行解說，接著石原從用兵觀點與關東軍的企圖來分析奪取吉林之必要性，最後由板垣建請採取斷然措施，惟本庄仍不願答允。因為對其來說出兵吉林不似柳條溝可藉「陣中要務令」作臨機處斷，吉林已非關東軍職務範圍之所在，未得勒命不可動員。再說先前閣議已做出「不擴大」之裁決、軍部也接連下了幾則指示，這些都足以令他猶豫再三。<sup>37</sup>最後在石原、板垣等苦苦勸說長達兩小時下，本庄才決定出兵，當時為 21 日凌晨 3 點，「本夜幕僚會議因涉及閣議決定事項，故情況極其激烈，軍令官十分心痛」。<sup>38</sup>21 日上午日軍多門師團便由長春出發進攻吉林市，翌日即告佔領全城。

石原等人在說服本庄出兵吉林的同時，也一再請求朝鮮軍儘速來援，因為一

<sup>35</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二卷滿州事変》，頁 31~32。

<sup>36</sup> 中村菊男，前引書，頁 129~130。

<sup>37</sup> 梁敬錚，前引書，頁 85。

<sup>38</sup> 中村菊男，前引書，頁 134。

且發兵吉林，則奉天將陷入真空，故亟需朝鮮軍前來協防。眼見關東軍的求援如此急切，林銑十郎司令以「事及至此，為防止皇軍的自滅，更為救護同胞，自不管本身毀譽褒貶和進退的是非」，故決定在沒有命令的情況下越境出擊。先前被擋在新義州的嘉村旅團在獲知進擊情報後宛如脫韁野馬般向奉天出發，並於 21 日下午抵達，隔天與步兵第十五旅團完成替換。當日關東軍的氣氛「大多頓時喜形於色，對朝鮮軍感佩不已」。<sup>39</sup>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關東軍在打下吉林、打算乘勢向哈爾濱進擊前遭陸軍省的安藤利吉兵務課長持陸相所下達「三勿命令」阻止，分別為：

- (一) 北上之兵不得越寬子城以北。
- (二) 勿管理滿鐵以外之鐵路。
- (三) 不得參謀本部之命令，勿得更有新軍事行動。<sup>40</sup>

這是軍部在考量國際環境之下所作的指示。當時國聯議程已排入中國控訴日本案，美蘇亦先後表達關切，故軍部不願在此節骨眼上再生事端。儘管石原等人仍不願就此收手，但於 24 日閣議做出關東軍應行撤兵之結論後，也只能暫時停止進擊，為下一階段的攻略作計畫。

由九一八事變爆發初期的一連串事態發展可以看出，關東軍才是整件事情的主角，日本政府、特別是若槻內閣完全只有被動、被迫追認現狀的份。事發當下奉天的領事、外交人員即已嘗試制止關東軍的武力使用，惟不被理會；稍後閣議更做出不擴大的裁決，依然對關東軍與朝鮮軍起不了作用。

事發當晚，森島領事曾向板垣呼籲以外交方式和平解決的重要性，不料卻反為花谷正持刀威脅，不許其插手統帥權之行使。翌日，林久治郎也提醒關東軍應注意日本的軍事行動在國際法上能否站得住腳，「但要阻止已經開始進攻、在隆隆炮聲中亢奮至極的軍人，是不可能的」。<sup>41</sup>對於關東軍所言「中國軍隊自行爆破鐵道並主動發起攻擊」的說法，林久治郎也不相信，這由他向幣原外相發的電報可以看出：

**第六三〇號：「據滿鐵木村理事送來的內線情報，為修復據傳為中方破壞之鐵路，滿鐵曾派去養路工人，但軍方不許接近現場。由此可知本次事件完全是軍部有計劃之行動」。**<sup>42</sup>

除了林久治郎外，像是滿鐵總裁內田康哉、吉林總領事石射豬太郎也對關東

<sup>39</sup> 同前註，頁 136。

<sup>40</sup> 梁敬錚，前引書，頁 86。

<sup>41</sup> 林久治郎，《滿州事變と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遺稿》，東京：原書房，1978 年 4 月初版，頁 118。

<sup>42</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一卷第一冊》，頁 6。

軍抱持懷疑，內田致幣原外相電文中提到：

「綜合種種情報，可斷定我軍此次行動為事先研究好的既定計畫之實施。且中方的不抵抗及我方軍事行動造成的小事故，必將刺激當地外僑，導致世界輿論對我不利，使今後的對外政策日益陷入困境，實令人不勝憂慮」。<sup>43</sup>

石射豬太郎則是在其回憶錄中這麼說：「當我接到柳條湖事件的消息時，我就懷疑其真實性。因為張學良雖然有很強烈的抗日意識，但也很清楚碰滿鐵線的下場會如何，更何況張現在人不在東北…當時我的直覺是一軍部又在胡搞了」。<sup>44</sup>上述三人的想法判斷一致指向關東軍才是挑起事變之始作俑者。其實早在事件爆發前一週，關東軍特務部長土肥原賢二便告知報界：「滿洲要發生之事，不可言明」，<sup>45</sup>益發證實關東軍在事變中的角色。

眼前最重要的是阻止事態惡化，此時林久治郎仍抱持著「只要不是出自於日本政府的方針，則政府應該能阻止它才對」的想法，寄希望於日本政府。<sup>46</sup>

然而，自 1920 年代中葉以來，日本政府陷入了長期的運作失靈。不論在政治或經濟層面都無法回應人民之期待，貪腐、效能不彰的政黨內閣與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此起彼落的罷工抗議事件，共同交織成當時日本社會的景象。面對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關東軍的跋扈擅權，內閣可以說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若槻首相曾多次向原田熊雄（時任元老西園寺公望秘書）訴苦，稱外務省和陸軍省的報告都到不了他手上，又說了諸如「局勢如此，我實在無法控制軍部」等等的話語，<sup>47</sup>頗有力不從心之感。關東軍之所以敢如此放肆、視閣議為無物，很大原因是出於軍部上層有意包庇。例如在閣議做出「不擴大」結論後，軍部雖曾致電關東軍命其停止行動，但任職參謀本部的橋本卻以私人密碼向關東軍參謀發了電報，稱參謀本部關於制止軍事行動之命令主要為應付閣議，「其本意並非要你們停止」。<sup>48</sup>橋本之言並非空穴來風，這從 20 日上午 10 點經陸軍首腦會議一致通過的「滿洲方面之時局善後策」可獲印證。在這個由作戰課草擬的善後方針中，相當程度推翻了閣議不擴大的結論，並決定「本事件未解決前，絕不使關東軍恢復原狀」，<sup>49</sup>且政府若不同意軍部欲藉本事變一舉解決滿蒙問題之想法，「那麼政府因此而倒臺也無妨」。<sup>50</sup>21 日上午，參謀總長金谷與陸相南次郎再次向關東軍發出電報，稱：

「一、貴軍將士共同奮鬥殊堪重視，對以身殉國及負傷者，表示深切同情。

<sup>43</sup> 同前註，頁 26。

<sup>44</sup> 陳鵬仁編譯，《日人筆下的九一八事變》，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 年，頁 136。

<sup>45</sup> James B. Crowley,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01-102, 112-113.

<sup>46</sup> 林久治郎，前引書，頁 118。

<sup>47</sup> 陳鵬仁編譯，前引書，頁 169。

<sup>48</sup> 易顯石等著，前引書，頁 164。

<sup>49</sup> 陳昭成，〈日本之大陸積極政策與九一八事變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66 年，頁 71。

<sup>50</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卷資料篇》，頁 117。

## 二、本職絕不使貴軍的行動成無意義之舉，定為徹底國家的威信而努力」。<sup>51</sup>

由此可知，關東軍一再違背「不擴大」決議，堅持繼續作戰實乃因其理念獲得日本陸軍高層之認同：早在事發前數月，陸軍幾位核心幹部便曾對關東軍所研擬「滿洲佔領研究計畫」表達支持，這些人包括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小磯國昭、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參謀本部的參謀次長二宮治重、負責情報蒐集的第三部部長建川美次等；<sup>52</sup>九一八當晚攻城的二十四釐榴彈砲也是永田鐵山應石原之託運至瀋陽、<sup>53</sup>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亦曾籌措十萬兩千日幣供關東軍起事所用。<sup>54</sup>事實上，關東軍不僅無視閣議之存在，就連天皇也不見得壓的住他們，這由其進攻哈爾濱受阻後，一度想於當地自立新國之舉可以看出。<sup>55</sup>總結事變後關東軍與日本政府的交手，可發現關東軍完全掌握了主動權，軍部則因理念認同故主張對其行為予以追認，導致政府、外務省都很難約束關東軍的躁進，但為顧及國際觀感不得不製造出一個不擴大的方針，事實上只能透過內閣決議、佐之以國際戰略的分析，勸阻關東軍從整體戰略利益的角度停止軍事行動，許多時候後者還比前者有說服力。畢竟對關東軍來說，一紙一紙空泛的閣議完全不具任何約束力。

10月24日國聯行政院通過了要求日本限期撤兵之決議。雖說該決議因日本反對導致不具約束性，但已明顯形成一股壓迫它的國際氛圍。日本政府對此自是了然於胸，不願見到這個節骨眼上關東軍惹出更多事端，令其疲於奔命。難得的是，該想法獲得參謀總長金谷範三的認同，表現出實際行動就是11月5日至11月27日間一連九次「臨參委命」之運用。「臨參委命」創始於日俄戰爭期間，意即天皇准將其統帥權之一部份，於奏准範圍之下，暫委參謀總長代行御旨之意。<sup>56</sup>金谷在10月時即有鑒於關東軍之難以駕馭，憂心長此以往將危害日本國家利益甚鉅，遂向宮中請求使用該權限獲准。

11月4日，日軍結合張海鵬部共八千餘人向嫩江展開攻勢，隔天金谷就向關東軍發出第一次臨參委命，命其不得越過大興車站。此舉讓關東軍諸參謀大感不滿，認為中央不信任現地軍隊針對情勢做出之判斷，於是由三宅帶頭向參謀本部抗議。沒想到這次參謀總長心意已決，除覆電「貴軍今欲指揮者乃新加之任務，不在原本任務之內且政治意味濃厚，自宜按臨參委命之指示大綱以為辦理」，<sup>57</sup>又一口氣連下四道臨參委命，反覆限制關東軍之行動。除來自國際的壓迫，日本政

<sup>51</sup> 關捷主編，前引書，頁480。

<sup>52</sup> 緒方貞子，《滿州事變と政策形成の過程》，東京：原書房，1981年8月，頁96。

<sup>53</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滿州事變前夜》，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頁424。

<sup>54</sup> 同前註，頁407~408。

<sup>55</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715。

<sup>56</sup> 梁敬錫，前引書，頁103。

<sup>57</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二卷滿州事變》，頁61。

府內部也出現了對關東軍進攻黑省的反彈，特別是各駐外使節先後表達了不滿，認為關東軍的躁進令他們在為國家行為辯護時陷入前後不一的窘境，長期下去日本在國際外交上將不再被信任，此絕非國家之福。駐義大利大使吉田茂在致幣原外相電文中提及：

**第一六九號電：「…近來形勢正向稍有利於我方轉變，此時卻要求馬占山下野及中國軍隊自黑龍江撤出，並欲進軍至齊齊哈爾，這不但會讓我國歷來之聲明被人視為虛偽，失信於列強，且多少將危害到這段期間來我代表在國聯行政院中力拼得來之地位」。**<sup>58</sup>

吉田的想法具體反映了駐外使節於說服駐在國政府工作上之困難，同時也得到政府內主張對華穩健者之共鳴，故 11 月中旬關東軍攻勢益發橫行、難以控制之時，芳澤（駐法）、松平（駐英）、吉田（駐義）、有田（駐澳公使）各駐外使節，做出了聯袂請辭之打算。此舉果然奏效，壓制住關東軍恣意妄為的氣燄，最終關東軍的行止被有效侷限於鄭家屯以東，佔領北滿計畫暫時中止。但是，這並不代表日本政府已能完全掌握關東軍，因為它的撤兵僅是給政府作個順水人情，令其作為外交籌碼之用罷了，此刻真正目標乃中國在東北的最後一個據點錦州，土肥原在天津製造的事端恰為之提供了南下的絕佳藉口。

如前所述，關東軍藉 11 月 26 日爆發的天津事變沿北寧路西進，欲藉援津之名，行攻錦之實。但於翌日參謀本部作戰課幕僚會議上，因天津暴動的真相為建川揭發外加憂心國際輿論，遂由參謀總長金谷向關東軍發出臨參委令，曰「貴軍救援天津，南過鄭（家屯）通（遼）線，遼河以西之獨斷行動，不得實行」，不惟口吻堅決，更於一夜之間連發四電對關東軍施加壓力，逼得本庄司令只好奉令將大軍調回遼河以東。

由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三個多月來日本政府與關東軍交手情況可看出，事變初期日本政府確實曾達成不擴大的決議，但一則國際列強尚未對事變直接做出反應，再則關東軍之理念亦獲得日本陸軍高層認同，故不擴大的決議幾乎對其產生不了拘束力。直到 10 月 8 日錦州轟炸招來列強反彈與國聯行政院 10 月 24 日通過限期撤兵之決議才逼迫日本政府更嚴肅看待關東軍的脫序行為並加強對其之控制，11 月間接連九道臨參委令即為明證。當然，日本政府對關東軍並非完全對立，意即日本政府也是支持對中國奪取利權的，差異只在兩者使用手段上的不同。對日本政府來說，它必須和列強打交道，盱衡國際形勢和區域權力結構，所以它不贊同關東軍窮兵黷武、凡事訴諸武力的思維，認為透過國際協調才能長保日本在東北的利權。正因兩者在思考模式上存有歧異，導致了三個月來一再看到「關東軍四處點火、日本政府急著滅火」的現象。但是，這一切在 12 月 11 日民政黨若槻內閣下台、由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接任組閣後有所改觀。政友會一向主張

<sup>58</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一卷第一冊》，頁 525~526。

對華強硬，基本態度與關東軍非常接近，其組閣象徵著日本政府與軍隊對侵略中國的態度、方式將逐漸取得一致，這由接下來的事態演變可資印證。

### 第三節 關東軍的謀略與中國之應變

1931年9月18日深夜的兩聲巨響，直接引出了六年後蘆溝橋之中日戰爭，間接引出十年後珍珠港之美日戰爭。在這場為期十四年之久的戰事裡，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都遭受嚴重損失，日本更成為史上第一個被原子彈攻擊的國家，並為聯軍所佔領、接受徹底的政體改造，這一切想必是板垣石原等人在密謀滿洲佔領時所始料未及。作為這場戰爭的起點，9月18日深夜柳條湖南滿鐵路之爆破吸引了眾人疑問的眼光。為什麼關東軍要自爆鐵路？炸毀鐵路在其全盤計畫中究竟佔有何種地位？這些都是本節所欲探討者。

#### 關東軍的行動謀略

根據當時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少佐參謀花谷正的說法，早在1931年春季左右，他們便擬好了柳條湖事件的大致計畫，<sup>59</sup>接下來就四處向中央軍部、朝鮮駐軍協調請援，積極為9月行將發起的滿洲佔領作準備。在這過程中，石原等人發覺如何能將爆炸範圍控制在不會顛覆火車、卻又能製造出聲響有其難度，為此還曾請工兵作過測試，態度十分謹慎。一切準備就緒後，18日深夜起的各項軍事行動便像按表操課般依序發動：10點20分炸毀南滿鐵路一段，接著以廿四釐重炮轟瀋陽，隨即兵分兩路向北大營、瀋陽城展開進攻，安東、鳳凰城、營口亦按原訂計畫迅速攻佔，連計畫外的長春都給趁勢奪取。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得以如此順利，全出自長期來對東北謀略之投入，包括始於1929年7月的「滿洲佔領研究」與對各戰略要地之考察、每週固定舉行的「佔領研究」討論會等。透過各式各樣的資料蒐集與情報、心得交換，關東軍諸參謀一步步拼湊出滿洲攻略的全貌，而自爆鐵路就是其心中最理想開場。

關東軍之建立始於1904年對俄作戰的勝利，其駐屯目的按1919年4月制定關東軍司令部條例第一條所言，在於「防備關東州與保護南滿鐵路」，第三條又稱「為防備關東州與保護鐵路，軍司令官在必要時得使用武力」。<sup>60</sup>換句話說，關東軍行使職權範圍僅限於關東州與南滿鐵路，除此之外的地區不可進入，這點在關東軍組織條例第二條亦有記載。<sup>61</sup>如此一來，關東軍根本無法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更別說佔領東北了。九一八事變前數天，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便曾詢問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是否可跨出鐵路附屬地追剿土匪，結果為林以需領事館同意為辭婉拒。鐵路以外地區事務多由外務機關負責，這是當時日本當局在滿洲地區的政治分工狀態。眼見無法主動出擊，張學良又不可能先發制人，關東軍只好採自行炸毀鐵路並嫁禍於東北軍、隨即以自衛為名大舉反攻的方式，揭開滿洲佔領之序幕。本庄繁在其遺書中寫道：「當時我軍僅一萬餘人，中國則約二

<sup>59</sup> 陳鵬仁編譯，前引書，頁61。

<sup>60</sup> 中村菊男，前引書，頁109。

<sup>61</sup> 梁敬錚，前引書，頁25。



十萬，如不急採行動，我軍有被殲之虞，故余基於自衛立場，發此（進攻）命令」。<sup>62</sup>行文至此，可知受本國法令之限制而無法主動於鐵路及附屬區域外發動軍事行動，是迫使關東軍自行炸毀鐵路的主要原因。藉此其方能以自衛為名，便宜行事並伺機擴大戰局。同時，在行使自衛權的名義下，日軍行動並不會違反 1928 年的非戰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非戰公約發起人凱洛格（Frank B. Kellogg）曾指出，「無論本約如何規定，各國均有權保衛其領土，抵禦攻擊或侵犯，並有權自行決定該情況是否需要為自衛而作戰」，獲得各簽約國之贊同。關東軍就是抓住這一點來開啓戰端並日益擴大戰局，直至整個東北盡為所吞。然而，日軍對於自衛權之行使是否過當甚至九一八當晚是否符合其行使自衛權之條件，均多疑點。對此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中這樣說道：「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軍在瀋陽及其它處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自衛措施。且在爭議進行中陸續發展之日本軍事行動，總括言之，亦不能視為自衛措施」，<sup>63</sup>可見關東軍假借行使自衛權之名、行侵略中國之實的手法已為國際社會所察覺並予以揭穿，只是當時大半江山已去，再多公義也無法挽回既定事實。

再者，關東軍也將「南滿鐵路遭襲」一事，巧妙地與在中國握有特殊利益之列強產生連結。原來中國自國民政府領導北伐以來，已逐漸掀起一股向列強收回各種利權的風潮，由於過程中往往揉合群眾力量、革命精神與正式外交之交互使用，故被稱為「革命外交」。在這股風潮下，中國收回了包括關稅自主權、租界、租借地等重要權利，雖說關於領事裁判權的撤廢談判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而未竟全功，但大體說來在這五年期間（1926~1931）中國已自列強手裡奪回許多權利，逐步擺脫半殖民地的狀態。然而，中國的所得不啻代表列強的損失，包括 1927 年 1 月英國被迫放棄漢口、九江租界，同年年底挪威、德、英、法等十一國與中國簽訂關稅平等新約、1930 年 4 月英國歸還威海衛租借地等，對其來說都是既得利益的出讓，故過程雖尚稱平和，但內心早生不滿。

在革命外交下，日本也被迫於 1930 年 5 月與中國簽訂了承認關稅自主的協定，不再享有影響中國稅率的能力。此時日本深刻感受到中國推動革命外交對自身利益的威脅，特別是在東北的既有權益。日本勢力伸入東北最早可追溯自日俄戰爭時，並於 1915 年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簽署中日民四條約後更加穩固。藉由該約，不僅將關東州的租借期與南滿、安奉鐵道的使用權延長至九十九年，還確認了日本在南滿、東蒙地區關於鐵道權益之優越性，其他像日人於南滿自由往來，從事工商業，為建築房舍或經營農業而得以租借土地等也都在此約中獲得保證。雖然透過中日民四條約日本達到了強化在滿洲勢力的心願，卻也激發了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sup>64</sup>背負弑父之仇的張學良在易幟後，更以行動響應革命外交號召，與國民

<sup>62</sup> 同前註，頁 20。

<sup>63</sup> 湯武，《中國與國際法第二卷》，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7 年 8 月，頁 640。

<sup>64</sup> 緒方貞子，前引書，頁 18~19。

政府採取同一步調，加速收回利權。除築成昂齊（昂昂溪至齊齊哈爾）、齊克（齊齊哈爾至克山）、洮索（洮南至索倫）等三條鐵路，實現張作霖的西部線計畫外，打通路（打通山至通遼）、瀋海路（瀋陽至海龍）、吉海路（吉林至海龍）、四洮路（四平街至洮南）、吉敦路（吉林至敦化）與洮昂路（洮南至昂口溪）亦有長足進展，搭配原有的京奉路與吉長路（吉林至長春），形成一個由中國控制的鐵路網，對滿鐵營運與日本在東北的勢力都產生衝擊。中國方面建構鐵路網以箝制滿鐵的用心，可從 1930 年東北交通委員會〈東北鐵路網計畫緣起〉一窺端倪：

**「為抵制中東路及滿鐵，只能實行鐵路網。鐵路網中最重要的是大幹線及夾住滿鐵和切斷中東路的東西兩幹線，再將其集中於北寧線，築良港建出口港，這樣不僅可制滿鐵於死地，且對中東路亦是嚴重威脅」。**<sup>65</sup>

除了鐵路網的建構，張學良還積極建設葫蘆島商港，企圖取代由日本壟斷的大連、安東兩港，以供東北進出口之用，同樣令日方憂心不已。另外在中日民四條約裡明定的東北地方商租權，亦被中國方面以行政法方式予以牽制，例如中國政府頒訂的「懲辦國賊條例」中，即明言禁止國人與外國人簽訂有關土地、礦山、森林等租賃契約，針對性質濃厚。1929 年 6 月起遼寧省政府各廳也陸續公佈了禁止購買日貨密令（工商廳）、禁止中日合辦合作事業的訓令（農礦廳）、收回滿鐵附屬地教育權的通令（教育廳）等法令，與中央一搭一唱，聯手阻擋日本於東北的商業發展。對此日方一再提出抗議，但張學良多採延宕敷衍之態度來打發，一時累積在雙方間的懸案高達五百件。<sup>66</sup>面對革命外交如火如荼的開展，日本政府感到十分煩惱。更令它為之氣結者是，在包括關稅、領事裁判權等一連串事項的談判中，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正廷並不把日本當成主要談判對象看待，反把精力放在英美法等國，認與上述三國談妥後，日本自會屈服，「其他各國全加起來，也無大重量」。<sup>67</sup>

體察到列強與日本一樣皆深為中國的革命外交所苦，關東軍遂做出自爆南滿鐵路、再嫁禍給中國軍隊的計畫，這麼一來不僅符合前述的自衛原則，也能塑造出一種「日本受害於中國革命外交，不得不起來反抗」的假象，有利於爭取列強支持，否則至少也是不插手。事後證明關東軍這一著棋的確發揮了作用，例如在事發一個月內的法國輿論，大多對日本抱以偏袒，稱日方之挑戰為對中國民眾反日的報復，且謂當今東省土匪及遣散軍隊橫行之時，日本之軍事行動實有必要（1931 年 10 月 15 日 Figaro 報）。尤有甚者，更將國聯調解遲遲沒有進展之責歸咎於中國（1931 年 10 月 15 日 Le Journal 報），敦促中國直接對日談判，以減輕國際聯盟的困難（1931 年 10 月 21 日 Le Temps 報及 Le Matin 報）。<sup>68</sup>事件爆發後，

<sup>65</sup> 鈴木隆史著，周啓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州》，台北：金禾出版社，1998，頁 395。

<sup>66</sup> 李恩涵，〈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與九一八事變〉，收錄於《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台北：國史館，1991 年 12 月，頁 258、262。

<sup>67</sup> 同前註，頁 255。

<sup>68</sup> 李雲漢編，前引書，頁 434。

英國輿論對日本的武力發動亦表達了理解與同情，聲稱當特權持有國（日本）在海外之合法權利因現地統治國（中國）的無秩序或違反國際法而遭受侵害時，特權持有國透過武力之行使來維護是合乎情理的。且基於昔日英日同盟之情誼與兩國在國聯中的緊密合作，英國選擇給予日本較多的偏袒。<sup>69</sup> 儘管國際社會同情中國的聲音也不在少數，如美國、德國等，<sup>70</sup>但因前者當時對國際事務仍抱孤立態度，後者國際份量亦不如英法，於是英法兩國此刻對日本的姑息對於後續事態發展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喪失第一時間撲滅關東軍氣燄的機會，終至難以收拾的局面。由此看來，關東軍見縫插針、利用列強不滿革命外交的心理，從自爆南滿鐵路這一步下手，的確收到成效。

談完關東軍自爆鐵路之因後，下一步要探討的，是關東軍謀略的另一重要組成，即其成立「滿洲國」的戰略考量。早在 1931 年 4 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便針對中國東北問題擬定一份三階段的解決方案，即以解決滿蒙問題為中心的《形勢判斷》：

第一階段：在承認中國對東北享有主權的架構下，驅逐張學良，令立一個能與日本密切合作的新東北王。

第二階段：不承認中國對東北享有主權，欲在日本的武力支援下，扶植東北成爲一個獨立國家。

第三階段：直接佔據東北，令其成爲日本領土一部分。<sup>71</sup>

按照這份《形勢判斷》，日本計畫分「親日政權」、「獨立國家」、「日本直接領有滿蒙」三階段，對中國東北實行佔領。關東軍於 9 月 19 日勢如破竹地橫掃東北後，以板垣、石原爲首的關東軍諸參謀一致主張直接將東北納入日本版圖，接受日本統治，也就是跳過《形勢判斷》的前兩階段，直接領有滿蒙，但這樣的想法卻遭參謀本部建川美次少將反對。建川認爲當下國際形勢並不允許日本併入東北，過於躁進反會招致美蘇等國之干預，故主張採建立親日政權的方式代替直接佔領。經過一番爭論，雙方最後各退一步，達成以扶植溥儀在東北建立傀儡政權、逐步控制東北的協議，即《形勢判斷》的第二階段。

建川之所以反對石原等人建議，主要還是考量到當時的國際規範。在 1921 年的九國公約中，開頭即規定「除中國外締約之八國堅決主張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此外，在 1926 年修訂的國聯盟約第十條中，也有「聯合會會員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的字樣，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做出明確保證。故建川感覺身爲九國公約簽約國與國聯常任理事國的日本，在此時若貿然將東北納入版圖，必定招

<sup>69</sup> 淺野和生，〈イギリスの同情と批判〉，收錄於中村勝範編《滿州事變の衝擊》，東京：勁草書房，1996 年 5 月，頁 339~341。

<sup>70</sup> 李雲漢編，前引書，頁 427~438。

<sup>71</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24~25。

致國際社會的反彈，屆時騎虎難下，恐將打亂日本在整個東亞的戰略布局。三國干涉還遼的殷鑑不遠，操之過急只會落的全盤皆輸。但他知道要抑制因連戰皆捷而正處於亢奮情緒的關東軍參謀們是不可能的，再者也的確應善用此輝煌戰果來為下一階段的擴張作準備，所以建川提出一折衷方案，就是透過扶植溥儀在東北建立傀儡政權，進而逐步控制東北。

在建川想法裡，因東北本來就是滿洲人的發源地，加上溥儀遜位後對復辟一事始終未曾忘懷，故此時若能說服其重出江湖並在日本協助下建立一個名義上由東北民眾自立、實質上服從日本指導的新國家，則不僅可杜國際社會悠悠之口，更有利於日本在當地擴張利益。因其見解確實有獨到之處，對石原等人所忽略的國際現勢加以提醒，故獲得了關東軍諸參謀的擁戴，接下來的演變即按照《形勢判斷》的第二階段所揭櫫：11月中由土肥原策動天津事變將溥儀劫至東北，隨即展開各項建國前的籌備工作；隔年（1932年）3月溥儀在民眾的三度勸駕下宣佈就任滿洲國執政，9月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雙方並簽署「日滿議定書」。因滿洲國之成立本為服務日本國家利益，故建國後便透過與日方簽署的各類附件協定、換文將包括自身國防、經濟、交通甚至政府組成等重要權力讓渡出去，儼然以日本的保護國自居，完全不像個自主國家，故有「滿洲國者，誠日本他力本願政策之產物，而非中國自主運動之成品也」之評。<sup>72</sup>當然，這也代表關東軍的謀略獲得高度落實。

回顧九一八事變當晚至滿洲國成立的事變進展，可發現大部分狀況都依循著關東軍的預料在進行。軍事行動所向披靡，瀋陽、長春、吉林、黑龍江、錦州在短短三個月盡落其手，完全無視敵我雙方於兵力上的懸殊差異：根據顧維鈞致國聯調查團說帖，中國東北邊防軍三省兵力共計兵士十七萬九千五百零五人，反之關東軍人數最多時也才兩萬三千多人，即便連在鄉軍人一併計入，亦僅四萬之譜，中國依舊難撻其鋒。政治上關東軍也能達成迅速平定佔領區秩序、樹立傀儡政權的目標，顯見其事前謀略之全面與深入。其實早於一九二七年七月關東軍便對東北戰略要地展開多次實地考察，同時還進行歷時兩年的「滿洲佔領研究」，投入之人力、物力不知凡幾，因此才能造就其在東北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對於中國現地的了解，關東軍比起日本政府自是高上一截，故他們敢無視於陸軍中央所主張的出兵日程（1932年6月之後），而執意提前至前年的9月發動，事後證明關東軍的判斷十分精準，東北軍確實不堪一擊。另一方面，出於對中國決策過程之高度認識，關東軍知道，作為一個弱國，事件爆發後中國絕不會輕易接受和日本直接談判，反而會尋求國際勢力的介入、調停，藉以避免在單獨談判中可能遭受的損失。果然，中國選擇於9月21日將衝突提交國際聯盟，請按盟約第十一條處理，阻絕了兩國直接交涉之可能，並開啓未來長達一年五個月中日

---

<sup>72</sup> 梁敬錚，前引書，頁280。

在國際聯盟內的激烈交鋒。以下即針對中國政府於事發當時的各種反應作一簡述。

### 中國選擇將爭議提交國聯的決策過程

九一八事變爆發的消息很快就傳到國民政府，19日晚間8時在戴傳賢主持下，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常委、中執委與中央監委等黨政要人共十七位於中央黨部召開了臨時會議，商討應變措施。與會人士大多主張「對外仍採訴諸國際聯盟，請其主持公道，對內則亟謀全國國民及本黨同志犧牲成見，一致聯合」，並作成下列四點決議：

- (一) 由常務委員會電請此刻正在南昌剿共的蔣主席回京。
- (二) 根據正式報告，繼續對日方提出抗議並電令駐外代表向國際間宣佈。
- (三) 即日發出對各級黨部訓令。
- (四) 從明日起每日召開中央談話會一次。<sup>73</sup>

9月21日蔣主席返抵南京，同意上述會議決定，並作成三點處理本次事變的基本原則：

- (一) 堅決抱定保護我國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
- (二) 維持東方的平和而達到維持世界的和平。
- (三) 尊重一切國際公約，尤注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sup>74</sup>

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國民必須確實團結、堅定沉著、加倍刻苦，「矢必死之心，作持久之奮鬥」。<sup>75</sup>同日蔣中正也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做了演講，名為「一致奮起共救危亡」，當中提及此次日本暴行恰可作為下列兩點之試驗：(一) 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或公理，及世界各國有無制裁橫暴、確保世界和平之決心(二) 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患。如果到了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無可忍且不應再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sup>76</sup>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將現階段國民政府的應變策略向國人做一解說，即：政府已將日人之暴行報告於國聯，並要求第一步先使日軍立刻撤退。而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國民亦一致誥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sup>77</sup>由事發後中國政府一連串會議結論與對外公報可看出，現階段他們計畫把解決爭端的權力交付國際聯盟，而不願與日本做直接談判。中國政府的心態十分易於理解：論實力，它絕

<sup>73</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六〇常務會議記錄〉，轉引自劉維開，前引書，頁8。

<sup>74</sup> 劉維開，前引書，頁11。

<sup>75</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國同胞書〉，轉引自李雲漢編，前引書，頁319~320。

<sup>76</sup> 蔣中正，〈一致奮起共救危亡〉，轉引自李雲漢編，前引書，頁321~322。

<sup>77</sup> 〈國民政府告全國國民書〉，轉引自李雲漢編，前引書，頁323~324。

對羸不過日本，故在這種敵強我弱之情勢下貿然走上談判桌，恐怕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但國際聯盟卻是當時最多國家參加也最有影響力的組織，先前亦有成功調解希臘與保加利亞邊境糾紛之經驗，且盟約中清楚載明「聯合會會員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字樣，凡此種種皆強化了中國透過國際聯盟來解決爭端的想法。下章開始將對兩國在國際聯盟的激烈交鋒作一探討，並從中分析日本政府於此時期的外交策略運用，亦為本文重點所在。